

新中国目录学研究述略

彭 斐 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目录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中国目录学,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三十四春秋。三十四年来,党和政府对发展书目工作非常重视,发布过一系列指示,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书目工作和目录学研究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书目工作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目录学研究紧密地结合生产和科学研究以及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需要,为发展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服务。出版物缴送本制度的确立与完善,为全面地完备地进行出版物的书目登记提供了物质保证。国家书目工作的发展,又为其他书目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和《全国图书协调方案》的公布,为书目工作的协调和协作,为目录学工作者进行学术交流,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建国以来,书目工作者和目录学研究者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指导目录学研究和书目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仅1949年10月至1979年底,总共编制的书目索引就有7783种,是我国解放前所编书目索引总和1600种的4.86倍。^①目录学是书目工作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丰富的书目工作实践是目录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源泉,是目录学研究的基础。书目工作的发展以及在实践中提出的各种问题,有待目录学的理论去指导,书目工作的发展推动着目录学的研究。目录学文献的数量和质量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它的进展情况。据统计,三十四年来,有关目录学研究方面的论文散见于各类刊物上的总计约有626篇,^②研究的内容涉及到目录学的各个方面。回顾建国以来我国目录学研究的状况,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推动当前目录学研究,提高目录学的科学水平,是非常必要的。

一

新中国成立三十四年来,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下面四个阶段:

一、1949年至1957年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第一个阶段。

这一时期,我国目录学研究处于奠基阶段。研究侧重于书目、索引编制原则与方法的探讨。例如,五十年代里,在苏联推荐书目工作经验的影响下,推荐书目在我国图书馆书目参考工作中占着很大比重,编出了形式灵活多样,内容新颖,选书精当,带有指导阅读的内容提要的推荐书目,和一些为读者喜闻乐见的读书计划,这些对于配合政治思想教育,优秀文艺书籍的阅读指导方面,充分发挥了书目的教育职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仅山东省图书馆1954—1956年编制的推荐书目就达80种之多。北京图书馆编制的《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在选书和内容提要的编写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朱天俊1956年发表了《推荐书目的编制和利用》一文,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推荐书目的社会作用及其编制原则和方法。廖延唐1957年《建国以来我国推荐书目工作述评》一文,对五十年代出现的推荐书目的状况作了初步的分析,就推荐书目的选题、选书、所收图书的著录和编排问题进行了评述,鉴于当时推荐书目的状况,他建议迅速组织书目协调机构,克服平行现象和人力物力的浪费,以加强书目工作

的效果。又如,适应向科学进军的需要,当时联合目录的编制问题提到议事日程,随即发表了毛坤的《论联合目录》、邓衍林的《编制联合目录的几个问题》等一些有价值的论文。关于提要的研究有杜定友的《书目与提要》(1953年)。在索引的编制方法的研究方面,有吕绍虞的《谈我国目前的报刊索引工作》、《评“全国主要期刊重要资料索引”》等论文。

在这一时期里,开始了目录学研究的国际交流。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苏联目录学方面的论著,这对促进我国书目工作和目录学研究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问题是当时一方面对苏联目录学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是不顾我国的国情,生搬硬套,给我国目录学研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个教训应当时刻牢记。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组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录事业概况》一文,简明扼要地叙述了我国古典目录学的产生,古代书目工作的成就及其发展特点,用一定的篇幅阐明了新中国书目工作的现状,书目工作如何有计划有步骤地配合祖国建设事业,为科研和生产建设服务中开展的各项活动和取得的效果。同时,对北京图书馆的推荐书目和参考书目工作的状况作了叙述。这篇文章发表在《苏维埃目录学》杂志1954年第37期上面,是建国以来第一次目录学研究的对外交流。

这时除了翻译《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目录学”词条以外,王重民在《普通目录学》讲稿中提出“目录学是一种研究图书目录编制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讲稿重点是目录学史,从我国目录学的起源至新中国成立,共分五个时期作了系统论述,为了解我国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简明的轮廓。吕绍虞在其所编《普通目录学》讲义中,列举了古今中外目录学家对于目录学的定义和内容范围的理解。同时也提出了他对目录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他认为“目录学研究的对象是目录”,“目录学是研究和评介出版物的内容和形式,并探讨目录索引编制的方式方法的一门科学”。与此同时,他针对当时我国目录学研究的状况指出:“如何很好的继承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学习苏联目录学的先进理论和方法,并批判的吸收西洋目录学的长处,建立起新中国目录学,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是目录学家和目录工作者当前的重要任务。”不足的是吕绍虞先生只列出了古今中外各目录学家对目录学的看法,而没有进行任何评述,使读者感到困惑,这正好反映了当时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实况。

二、1958—1965年是新中国目录学研究的第二阶段。

这一时期是我国书目工作和目录学研究蓬勃开展并取得丰硕成果的阶段。这一时期编制的各类型书目总计4099种^③,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我国国家书目体系;联合目录报导体系;文献检索刊物体系;全国统一编目等方面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书目工作实践为目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书目工作实践的不断深入发展,迫切需要目录学理论的指导。

这一时期里,目录学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关于目录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从五十年代末开始,我国目录学界开展了以“目录学研究对象”为中心的一场有关目录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大讨论,这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第一次这样广泛、深入、目的明确而又富有成效的学术大辩论。这场辩论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围绕着关于目录学研究对象问题,涉及到目录学的内容和范围,目录学的原则,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书目的本质等有关目录学基本理论的各方面的问题。参加讨论的人员除了老一辈目录学家以外,还有不少青年目录学家,既有从事教学和研究的目录学工作者,也有长期从事书目工作实践的同志,还有其他学科的学者专家。他们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纷纷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彼此辩难,非常热烈,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关于目录学理论研究有一个成就是值得提出来的,即开展了对列宁目录学思想的研究。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不仅善于利用书目,而且亲自编制书目,在他撰写的书评和签署的文件中,提出了关于目录学理论和书目工作建设的精辟的见解。我国目录学工作者认真研究了列宁关于目录学的宝贵遗产^④,这对发展我国书目工作和目录学,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列宁在对尼·亚·鲁巴金《书林概述》的评论中,为苏维埃目录学奠定了布尔什维克的党性原则,也是我国目录学的指导原则。列宁亲自编制的马克思主义参考书目,为我们编制书目树立了学习的范例。

三、1966—1976年为第三阶段。

正值我国目录学研究步入繁荣、兴盛和取得丰硕成果的时刻,大动乱开始了,目录学研究队伍被拆散,目录学教学停顿了,目录学研究也就无法进行,专业刊物也停止出版发行。这一切使得刚刚走上正规的目录学研究又遭受重大的摧残。

四、1977—现在是新中国目录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目录学研究又重新活跃起来,呈现出解放以来少有的盛况。据统计,1977年至1982年发表在报刊上的目录学论文约349篇。^⑤从选题来看,目录学基本理论51篇,占14.5%,目录学史的研究111篇,占总数的31.8%,各类型书目研究90篇,占28.6%。1982年出版了建国以来第一部目录学教科书——《目录学概论》,^⑥它概括和总结了建国以来目录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既注意对目录学基本理论、历史知识的阐述,又注意书目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不仅是高等学校图书馆学专业本科生学习的教材,同时也是广大图书馆工作者和其他文科专业学生的学习参考资料。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目录学专著,如新夏的《古典目录学浅说》,^⑦是一部深入浅出比较通俗的古典目录学专著,作者从“目录学概说”、“古典目录学著作和目录学家”、“古典目录学的相关学科”、“古典目录学的研究趋势”等方面进行论述,对学习和研究古典目录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徐召勋的《学点目录学》^⑧是一部内容丰富,比较通俗而又带有学术性的雅俗共赏的目录学著作,它既是广大科学工作者普及目录学知识的重要读物,又是指导书目工作实践的必要参考书。《四川图书馆学报》发表了吕绍虞的遗著《中国目录学史稿》,《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连载了王重民的遗著《中国目录学史料》,这些为研究中国目录学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学会的相继建立,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目录学研究活动有计划的开展,各级学会均设有目录学研究组,以小型多样的方式开展研究活动,与此同时,图书馆学会的成立又为目录学研究成果的交流、推广开辟了一条重要渠道。各级学会编辑出版的学术刊物,如雨后春笋,为目录学研究提供了交流的园地。1983年8月在沈阳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目录学专题学术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来自各类型图书馆和情报部门从事书目工作的同志,还有从事目录学教学和研究的目录学工作者,会议收到的学术论文共220多篇,反映了广大目录学工作者充分认识到目录学是一门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科学研究的指南,是书目工作实践的理论基础。这次目录学专题学术讨论会围绕着书目工作如何为四化建设服务和国内外目录学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的问题开展讨论,涉及的内容丰富多彩,有对我国当代目录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研究,有的是关于专科学目学和计量书目学、书目控制论和比较目录学的探讨,还有对国外目录学研究现状的评述,也有关于我国书目工作现状和书目编制方法的研究。这次目录学专题学术讨论会不仅疏通了目录学情报交流的渠道,而且也是近年来我国目录学研究成果的一次检阅,它将对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建国以来,在目录学基本理论和目录学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一、关于目录学基本理论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广大目录学工作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对于目录学基本理论问题开展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特别在近几年来,目录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出现一些可喜的变化,这首先表现在近年来开始注意从我国目录学整体发展的高度来探讨目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把关于我国目录学的发展方向和道路,我国目录学的理论基础等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将目录学基本理论问题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与当前书目工作的实际联系起来进行探讨,把书目方法提到方法论的高度作为目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来研究。这些进展从近年来发表的一些论文可以看出。如乔好勤的《当前我国目录学研究的方向和任务》(《图书馆界》1982年)、《现代科学技术与目录学的发展》(《图书情报工作》1982年),陈耀盛的《论目录学的科学基础》(《四川图书馆学报》1981年),彭斐章、谢灼华的《关于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等。

其次是对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所出现的新的学科分支的研究有所注意,例如,利用控制论和系统分析法对书目控制的基本理论进行翻译、介绍和探讨,对将数学、统计学方法引进目录学后产生的计量书目学的研究,对于比较目录学的研究等,从全国图书馆学会第三次科学讨论会和全国目录学专题学术讨论会上交流的论文,以及专业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来看,这些方面的问题的探讨与研究,正在引起我国目录学界的兴趣和关注。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应当进一步结合我国书目工作实践,有计划地进行深入的探讨。

再次,关于目录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有了新的进展。我国目录学界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开展了以“目录学研究对象”为中心的关于目录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大讨论。广大目录学工作者通过各种学术会议或学术刊物发表自己对于目录学研究对象问题的看法,辩论十分热烈。这一期间出现的关于目录学研究对象的看法,归纳起来有下列四种:(1)图书说:持这派论点的同志认为,“目录学是研究图书的一门科学。目录学是通过查寻、鉴别、著录、部次图书规律的一门科学。”^⑧(2)目录说:主张目录学研究对象是目录的同志认为,“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目录,对目录工作实践和目录学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目录学既然是目录工作实践的理论总结和概括,所以只有以目录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才能真正抓住目录工作的中心和本质,才能进而全面、深入地分析、研究和总结目录工作实践的全部内容。”^⑩(3)图书和目录说:持这派论点的同志认为,“当代目录学的任务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推荐好书,指导阅读。根据上述任务,当代目录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图书,其次是书刊目录。”^⑪(4)关系说:认为“目录学是以利用图书为目的来探索记录图书的规律的一门科学。”“记录图书和利用图书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目录学的对象。”^⑫这场讨论虽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但是,它为目录学界的学术讨论开创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新风气,同时对推动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这场讨论由于大动乱的开始而被中断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目录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勇于争鸣,关于目录学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在中断十年之后,重新开展起来了。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在总结和评述五十年代末开始的目录学研究对象问题讨论中各派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矛盾说:认为“目录学是研究目录工作产生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揭示与报导图书资料与人们对图书资料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目录学领域里诸矛盾现象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也就

是目录学研究的对象。”^⑬目录事业说：认为“目录学是研究目录事业及其产生、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目录学研究对象是目录事业。”^⑭图书、目录、读者三者关系说：认为“目录学的定义，简单的说，是研究图书、目录、读者关系的一门学问。”^⑮另外如陈一阳在《目录学研究对象和定义新探》（《图书情报工作》1983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目录学是研究对所有图书文献资料实行目录控制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尽管各派人物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关于目录学的定义和目录学研究对象问题的看法，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各派论点渐趋接近，正如吴裕宪在《试论“目录学研究对象”之分歧》（《图书馆学研究》1982年第3期）中说道：“应当看到争论的分歧有着共同的基础，这就是从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是图书众多和人们对图书特定要求之间矛盾所产生的这一共同认识出发的。也即目录学要解决的问题和要达到的目的是掌握目录工作发生发展运行的规律，从而进一步指导目录工作”。总的看来，近几年的研究，已趋向从事物的规律、矛盾、本质等方面来探讨目录学研究对象。规律说正被多数人所接受。多数同志认为，具体感性事物不能构成目录学的研究对象，目录学作为一门科学，应当研究规律。讨论正在深入，真理愈辩愈明，我们深信在生动活泼的学术讨论中，目录学研究对象问题，终将达到科学的统一。

二、关于中国目录学史的总结与研究

我国目录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书目文献极其丰富，目录学家代不乏人，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形成自己的独特传统而著称于世。解放以来，我国广大目录学工作者力图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根据“古为今用”的方针，对目录学史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据统计，三十四年来，有关目录学史的总结和研究的论文约141篇，占同期全部目录学论文的22.5%，研究的课题是比较广泛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论文中的大多数是关于我国古代目录学家或某一具体书目的研究与评价以及书目方法的总结，例如：张遵俭《中国古代卓越的目录学家——刘向、刘歆父子》（1957年），吕绍虞《关于“别录”、“七略”的几个问题》（1963年），张涤华《“别录”的亡佚及其辑本》（1963年），王重民《“隋书·经籍志”的初步探讨》（1963年）、《“七志”和“七录”》（1962年）、《论章学诚的目录学》（1963年）、《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1963年），钱亚新《试论章学诚对目录学的贡献》（1962年），王绍曾《十八世纪我国著名目录学家周永年的生平及其主要成就》（1981年）等。应当看到，对我国著名的目录学家和有影响的书目的分析研究，对于继承和发扬古典目录学的优秀传统，具有重要的价值。

近年来，在我国目录学史的总结和研究中，显示出以下特点：首先，出现一系列对我国某一历史时期目录学发展特点及成就的研究的文章，例如，来新夏《清代目录学成就浅述》（《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一文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清代目录学研究的成果，他认为清代是我国古典目录学兴盛、发达的阶段，有着出色的成就——它表现在目录学著作成果丰硕，目录学学术领域的广阔开拓，目录学的时代作用以及致力于目录学的人才辈出等方面，使读者逻辑地得出清代目录学的成就超越于前代，成为当时的显学，同时它又是我国封建社会目录学成果的顶盛时期，为资产阶级目录学的产生和发展开辟了道路，显示出清代目录学总结前代、开启后来的特色。乔好勤《略论我国1919—1949年的目录学》（《云南图书馆》1982年第1期）一文，从1919—1949三十年间文献内容、形式和数量的变化，书目工作队伍的不断扩大，方法技术不断改进，组织管理体制不断完善等情况出发，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我国这一时期目录学派别的形成和取得的主要成就，试图探讨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规律。近年来试图从联系的、整体的观点出发对某一个历史时期目录学发展的概况及其规律探讨的文章还有：

谢国桢《明清时代的目录学》(《历史教学》1980年第3期),朱允尧《我国古代目录学优良传统浅识》(《图书与情报》1981年第1期)等。

其次,近现代目录学研究有所加强。解放后到六十年代,在目录学领域里,对于我国近代目录学家及其目录学思想的研究,几乎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发表的论文屈指可数,比较有份量的要算陈光祚的《梁启超的目录学理论观点和实践活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3年第4期)一文,对我国著名的改良主义者,近代目录学史上比较重要的目录学家梁启超的目录学理论观点和实践活动,进行了分析和评论,引证了大量的资料和论据,阐明了梁启超的目录学理论与实践,反映了我国近代资产阶级目录学的产生和发展,他是这一时期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的目录学实践活动,对于当时目录学新貌的产生,起了发凡起例、开拓局面的作用。可是,当时这样的研究论文太少,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建国以后,对于我国近代目录学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个空白点。1980年彭斐章、谢灼华在《关于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建国以来我国目录学史研究的成就及问题,进行了评述,特别对目录学史的研究重点提出了看法,文章指出:“近现代目录学史的发展是一部新与旧的交替、进步与落后斗争的历史,也是封建主义目录学衰亡,资产阶级目录学建立和形成的时期,同时也是西洋目录学传入,影响我国目录学发展的时期,所以,无论从历史发展的阶段上,还是从目录学的内容上,都应作为我们研究的着重点。”^⑩文章还指出应对一些有贡献的近现代目录学家梁启超、姚名达等进行重点的研究与探讨,确定他们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这些论点和建议得到了学术界的赞同,近年来,对近现代目录学家及其目录学思想的研究有所重视,出现了一批研究文章,像卢贤中《论姚名达的目录学理论》(《江西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鲁海《阿英在目录学上的贡献》(《四川图书馆学报》1982年第1期),韩继章《余嘉锡目录学思想初探》(《湘图通讯》1982年第4期),方衍《略论张之洞的目录学》(《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3期),张厚生《郑振铎在目录学上的成就与贡献》(《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等。

再次,对目录学家和书目的研究范围比以往扩大了,是目录学史研究的又一特点。过去是集中对我国古代少数杰出的目录学家和几部有价值的书目的研究;这些当然应该研究,直到今天,这些研究还很不系统,很不深入。近几年来开始对一些以往不被人们重视的目录学家如欧阳修、尤袤、黄虞稷、孙星衍、姚振宗、张元济、顾广圻、阿英、周永年等的生平事迹、目录学实践活动及其目录学思想的研究,丰富了目录学史的内容。以往对于书目的研究仅局限于《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几部影响较大的书目的研究,近年来对于书目研究的范围也扩大了。这些都是近年来我国目录学史研究中新的变化。

总之,回顾新中国成立三十四年来我国目录学的历史和现状,虽然经历过曲折的道路,总的来看是向前发展的,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整个目录学研究与我国四化建设的要求,与现代科学的发展,与书目工作的现实需要,还很不适应。对于我国目录学史的总结,与我国目录学的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极不相称。这种状况,应当迅速改变。

当前,目录学研究的任务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加强目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克服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目录学理论应当指导书目工作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重视目录学研究成果的推广与应用。历史不容割断,要全面总结我国目录学的发展规律,认真研究我国目录学的优秀传统,作为发展现代目录学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目录学的借鉴。从我国国情出发吸收外国目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丰富我国目录学的内容。(下转第32页)

系着的。例如,目前我国重点建设与轻工业生产都急需钢材等重要材料,而这些材料的供应缺口又很大,简单地用压一方而保另一方的办法,就可能犯战略性的错误。因此,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尽可能增加生产,使社会产品总量能“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否则,就会欲速不达。

1983年7月

注 释

- ① 《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刊,第336页,82年数字是根据有关数字推算的。
- ② 《经济参考》1983年6月6日。
- ③ 《经济参考》1983年6月3日。
- ④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和《关于198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的数字整理的。1978—1981年总产值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1982年按当年价格计算。
- ⑤ 转引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 ⑥ 转引自《工业结构》,企业管理出版社1982年版,第203页。1960年和1970年的数字是根据有关数字推算的。
- ⑦ 根据《外国经济结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72页的数字整理的。
- ⑧ 《列宁全集》第1卷,第72页。
- ⑨ 《列宁全集》第4卷,第143页。
- ⑩ 刘洪、魏礼群:《我国国情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红旗出版社1982年版,第87页。
- 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6页。

(上接第86页)不断开拓目录学研究的新领域,开展专科学目学的研究,适应现代科学发展的需要,积极开展计量书目学、书目控制论和比较目录学的研究。创造条件,建立目录学研究机构,制定统一的目录学研究规划,创办目录学刊物,疏通目录学情报交流的渠道。加强目录学研究教学的联系,促进目录学高、中级专门人才的培养,扩大目录学研究队伍。只有这样,才能使目录学在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作出新的贡献。

注释:

- ①③ 冯秉文:《新中国书目工作三十年》,载《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1981年第6期。
- ②⑤ 据兰州大学图书馆编《图书情报档案资料索引1950—1981(上)》和近年来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所载目录学论文的统计。
- ④ 彭斐章:《学习列宁关于目录学的宝贵遗产—纪念伟大列宁诞辰九十周年》,载《图书馆学通讯》1960年第4期。
- ⑥ 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目录学概论编写组编《目录学概论》,1982年中华书局。
- ⑦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1981年中华书局。
- ⑧ 徐召勋:《学点目录学》,198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
- ⑨ 王文杰:《试论目录学的研究对象》,载《武汉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
- ⑩ 周学浩:《关于目录学的研究对象问题》,载《图书馆》1961年第3期。
- ⑪ 张遵俭:《目录学初解》,载《图书馆》1962年第2期。
- ⑫ 朱天俊:《目录学对象浅探》,载《图书馆》1961年第2期。
- ⑬⑭ 彭斐章、谢灼华:《关于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 ⑮ 孙二虎:《目录学对象诸说质疑》,载《图书情报工作》1981年第6期。
- ⑯ 张克美:《谈谈我对目录学对象、定义的看法》,载《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二次科学讨论会论文摘要》,1982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309页。